

回忆平郊武工队

王树瑞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昌宛根据地侵犯。为了适应新形势斗争的需要，1946年夏，我昌宛县委决定建立平郊武工队（那时北京称北平）。区长王秀川同志任武工队长，区委书记宋志远、郝宝田、高树存和李子明同志都先后任过政委。我和张国栋同志任敌工委员，王志本同志任城联委员。武工队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党、建政、征购、扩军，用各种方法打击敌人。活动地区主要是靠近敌占区的边沿地带和被敌人侵占的一些村镇，北至羊坊，南至香山大岭，东至清河、沙河，西到妙峰山，中间有二百来个村镇。

这一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是战略要地。它距离北京只有三十来里地，是平绥铁路的要冲，敌人支援北上的辐重都要经过这里，所以，敌我斗争相当激烈。平郊武工队就在这一带向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忆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在昨日，历历在目。下面作一简要记述。

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

我们武工队神出鬼没，经常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炸毁敌人的军用列车。那时候，我们把这些行动叫“破交”。

1946年8月，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指示我们配合察哈尔东线战役（即怀东战役），把敌人往南口一带运送弹药的军列炸掉。队长王秀川同志带领我们五、六个人，潜伏在平绥线上清河、沙河之间的汤家岭。列车快到的时候，把炸药和地雷安放在铁路上，列车一到，我们就拉着了导火索，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完蛋了。那些满载弹药的车箱，一节顶着一节往高里爬，一直爬到最高处，先是把车头顶出铁轨，随后整个列车犹如一只巨蟒遭雷击，轰隆隆似山崩地裂翻倒在地，炸个粉身碎骨。这次“破交”，敌人损失很大，直到11月份东线战役胜利结束，敌人还没有收拾完残局。老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夸我们武工队是神兵。县委还通报表扬了我们。

后来我们又成功地炸毁了一列敌人的军马列车。由于敌人的铁路运输不断遭到武工队的破坏，他们就沿铁路线每三里地筑起一座碉堡，使全段铁路都在他们的火力射程之内，可是那也挡不住我们的“破交”活动。

1948年4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甫同志来到武工队驻地七王坟村，召集大家开会，交给我们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他先给我们讲了全国解放战场上的形势，随后说：“华北野战军二纵要到东北参战，路过京东铁路，为了防备敌人发现阻止，保证二纵按时安全通过，需要你们在清河至沙河之间‘破交’，时间在明天上午十点。”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当时不但敌人在铁路沿线封锁严密，而且武工队驻地距离“破交”地点三十余里，中间要经过敌人十几道封锁线。常甫同志说：“这个任务难度大，可能会有牺牲，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为早日解放全中国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最后他问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一定完成任务！”当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都觉得为早日解放全中国出力的时候到了。会后，我们二十四名队员做了出发前的准备。大家纷纷把自己的东西交赠给留守的同志。我把张国栋送我的一支黑杆两头平顶的自来水笔、十斤粮票、一个手章、五角钱交给了王志本同志，我跟他他说：“我要回不来，钢笔和手章留给你做个纪念，粮票交给伙房，五角钱替我交党费。”当时我想：只要完成任务，死了也值得。

天黑以后我们出发了，穿野地，走小道，绕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夜急行军，赶到了战斗地点小牛房附近。我们埋伏在一片大柏树的坟地里。这次“破交”的指挥是尚木森，按照计划由地下党梁富亲自安排，上午九点五十分我们吹响了第一遍口哨，队员们拉开了距离，第二遍口哨，个人把自己的炸药安放在铁轨上，第三遍口哨，点燃导火索迅速离开一百米外观察、记录响爆数字、“轰、轰、轰……”最后只响了二十二响，还有两个没响，我们又命令冲回去检查，直到全响了才后撤。

敌人没想到我们会在大白天没有列车通过的条件下“破交”，打他一个冷不防。也没发现我们，直到我

们第二次冲回去的时候，他们才开枪扫射。地里的农民、路上的行人乱成一团，我们一面指挥老百姓跑，一面集中到树林子里。这时候，北安河、羊坊的伪军出动了。向我们两面夹击，我们被迫退到一块坟地里，枪声四起，眼看包围了我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见远处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原来是县委书记常甫同志带领县大队冲杀过来，使我们二十四名队员安全脱险，无一伤亡，胜利完成了任务，保证了二纵顺利通过京北铁路，为解放全东北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闹得敌人脑袋疼

我们武工队经常深入群众开展活动，灵活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闹得敌人脑袋疼，一点办法没有。

那个时候国民党经常抓壮丁。有钱的主儿，可以买兵，让别人替他去，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去，也能安排在安全保险的地方，当炮灰的自然都是穷人的孩子。1947年底1948年初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县委指示我们，开展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破坏他们抓壮丁。我们武工队就分头到各村开群众会、青壮年会，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讲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面临失败的必然命运。那时候，宣传工作很少有现成的宣传材料。领导一布置，大家就开动脑筋想办法，创造出许多生动活泼的好形式。张国栋同志会唱京剧，他就编了许多词，用京剧腔调唱给老百姓听，效果很好。现在我还记得两段：

站立在面前把话讲，
尊一声老乡听端详。
别的话儿我不讲，
讲一讲日本鬼子侵我中央，
芦沟桥头枪声响，
国民党不抵抗逃奔了南方，
八路军真勇敢又把北方上，
抗战八年日本投了降。
日本投降人人乐，
恼恨那国民党他又还了阳，
它由南方发大兵又把北方上，
又是抓兵又是建大乡，
又是奸淫又是抢，
闹得百姓没有了主张。
没有主张，要想一想，
乘机机会参军拿起三八枪。
跟着共产党，
打败了蒋贼，
民主扬啊！

还有一段是鼓励老乡逃兵抵抗国民党抓壮丁的：

站在面前把话答，
尊一声老乡听根芽，
只因为蒋介石又把内战打
抓捕壮丁我才逃出了家。
你不跑，他就抓，
你要是跑了呀，他就没办法。
军民团结一齐打，
打垮了蒋贼再回家呀。

经过我们的广泛宣传，在羊坊、前后沙涧、台上、梁家园、埠头一带，先后有一千多青壮年逃到区政府所在地的妙峰山上，打乱了国民党抓兵的计划。

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很讲究策略的。有时候召集敌伪人员家属座谈会，通过家属做敌伪人员的工作，动摇他们的军心；有时候给伪乡长保长去信，威吓他们交公粮，真假虚实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在西北旺大乡据点不远，有个六里屯，保长叫宋永宽，有一次我们写信公开向他要粮，警告他：“如果不交，就要你的脑袋”。宋永宽拿着信跑到西北旺敌人据点，向敌人提出辞职逃跑，他说：“我不给八路送粮，他们要我的脑袋；我给他们送粮，你们要我的脑袋，我只有辞职逃跑是一条活路了。”这下可把敌人难住了：让他逃跑，他们的事也没人办了，不让他逃跑吧！八路怎么对付？想来想去，伪连长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们睁半拉眼合半拉眼，你绕道给八路送去，千万别让外乡的知道。”这样，宋永宽给我们送粮就成了合法的了。其实呢？宋永宽是咱们的地下党员，这是我们摆的迷魂阵。

宋永宽同志干革命很坚决，那年他被特务董孚告密，国民党二〇八师把他逮去，差点没打死他，在家里养了一年，就是那样，他也没动摇继续为党工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47年秋天，队长王秀川同志带领我们四个人在六里屯开展工作，由于特务董孚的告密使我们遭到敌人的突然包围，要不是他巧妙的应付为我们解了围，我也许活不到今天。

那天，我们几个正在屋里玩纸牌，突然跑进来一个老太太，她风风火火地说：“不好了，快跑吧，敌人来了！”我们四个人一齐跑出了后院，藏在打谷场边上的厕所里。只听敌人进了院，又打又骂问：“八路跑哪儿去了？”我们听见老乡们说：“没瞧见。”正在乱的时候，宋永宽跑来了，只听他说：“哥们爷的怎么回事？有八路？别听那风言风语的胡说八道，有八路我会不知，走、走、走，先到那边歇会儿去，”他连说带推，把伪大乡队的让到保公所里，让跑腿的买了一筐箩点心，沏上茶水，让他们吃个够，走了。

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在温泉以南三四里地，有个村子叫白家疃，这里是交通要道，敌人设立了据点，把守很严，1946年到1947年春，我部队几次袭击了这个据点，可是敌人又恢复了起来，而且碉堡越筑越高，伪军从十多人增到一百多人，到了1948年的8、9月份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敌人的反动气焰已经一落千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又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解放战争的重大胜利，宣传北平城里学生示威、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同警察搏斗的情况，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召集敌伪人员家属座谈会，让他们给自己的亲人写信，动员他们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我们还给敌伪人员的头子写信，指出国民党的末日为期不远了，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不要继续作恶了。那时候，村村有我们的传单、标语。

据我内线人员反映：白家疃据点的敌人整天提心吊胆，夜里不敢在据点里住，偷偷的躲到南山上去，军心已乱，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我们工作得好，劝降是可能的。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请示了政委（区委书记）李子明同志。经区委批准，派张国栋和我两个人空手上南山说服敌人。那是1948年10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当我们走到山半腰一个灰窑的时候，忽听一声大喊：“干什么的？”我俩抬头一望有一百多敌人手持刺刀枪向我们围过来。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和你们谈判来了！”张国栋同志口齿伶俐，说起话来比手划脚，富有鼓动性，气魄很大。眼看着敌人的刺刀伸到了脚前，他不慌不忙，抖擞精神，挥起手大喊：“你们不要这么干，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怕死我们就不空手到这里来了。”走在前边的敌人站住了，张国栋同志就大声疾呼地向他们讲开了形势：“我们正告你们，山东济南已经解放了，东北也将全部解放，东北大军马上要进关了，国民党的命运不长了，你们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一条光明大道，你们要动武是死路一条！”张国栋同志是本地人，他认识不少敌伪人员，接着他就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随后他说：“咱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你们家里病倒的父母、挨饿的孩子，妻儿老小都怕你们死在外边，盼望你们早日回家团聚，都不愿妻离子散。如果你们今天放下武器，我向你们担保，回家过太平日子，过去的事绝不追究。何去何从从你们要好好考虑！我劝你们收起顽固抵抗这一套，你们杀死我们两个共产党员算不了什么！可是你们的后果要想一想，八路军是饶不了你们的！”说得敌人个个发愣，亚赛木头人了。这时候，张国栋同志发命令一样喊道：“把枪放下！”伪军你看我，我看你。紧接着他又喊道：“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国家过太平日子！”许多伪军说：“愿意。”我们说：“好，放下武器，马上给你们开路条！”话音一落，只见刺刀收回去了，上膛的子弹退出来了。“把枪架到这来，站队集合！”敌人乖乖地听我们俩调遣，一点数，有一百二十多人，一百支步枪，十三支手枪，一挺机关枪，一支冲锋枪。我们把他们带到大乡据点，以武工队的名义给他们开了路条，当场解散了全部伪军，枪支弹药让大车拉着，十三支手枪我用绳子串起来挎在肩上，得意洋洋地回武工队驻

地。

县委敌工部长李云、区委书记李子明同志到武工队开庆功大会，号召大家学习张国栋和王树瑞勇敢机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严惩顽敌

这一带地区，有几个反动家伙，县委指示一定要严惩，不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他们是不会老实的。

西北旺有个特务叫董孚，四十多岁，中等个，平脸。他是国民党二〇八师的铁杆特务。他多次破坏我们扩军、征粮，我们也多次争取他转变，他死不回头。这个家伙很狡猾，我们几次抓他都没有成功。他经常改变服装打扮，住所也不固定，有时他推个货郎车假装卖针线的，走乡串户，刺探我方情报，了解各村骨干。六里屯的地下党员伪保长宋永宽同志，就是他向二〇八师告密的。

西北旺驻有二〇八师一个连和一个伪大乡队，设有两个据点。1947年秋，武工队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抓董孚，我们埋伏在村外一块菜地的园子房里，听群众反映，他常经过这里。我们在这儿等了两天，也没见他个人影。等到第三天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董孚果然推着货郎车过来了，二班长认识他，一见他来了，马上要迎头去抓，我一把拉住他说：“别动，还是让他走过菜园子道口好，我们从背后打他个冷不防。”因为迎面出去，他一发现就要跑，你一开枪，据点里的敌人就发现了。”当他推着车走过园子口，我们从背后突然钻出来，出其不意，他还没明白过来就把他的嘴堵住了，我们连拉带扯，把他弄到玉米地里，按倒了，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因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能打枪，二班长就用刺刀扎他的屁股和腿，血流一地，当时认为他活不了，可是后来听说他没有死，我们就又给他写信，告诉他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不改恶从善，马上就要你的小命。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活动。

太舟坞有个地主叫甄明顺，这个狗特务自己有枪，早想抓他没得机会。有一天，张国栋和我在东埠头活动，听说甄明顺娶儿媳妇正在办喜事。我们两个一商量，晚上就去了。因为我不认识他，进了院子我就上了房，张国栋进了屋一看没有他，我在房顶上看见猪圈里有个黑影，我就把张国栋喊出来，同时我喊：“一班、二班埋伏好，听指挥”！（其实就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也下了房，一看他真在猪圈里，我个子大有劲，跳进猪圈，一把把他拉出来，我们俩把他拉出一里多地，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一手抓住他的脖领子，举起手枪，照他脸就是一梭子，他应声倒下了。过两天，我们要贴枪毙狗特务甄明顺的大布告时，有人说他没死，眼睛打瞎一只，脸上穿了两个洞，在北京住院呢，布告没贴，我们一打听果真没死。等他出院回来，我们给他写信，令他交出手枪，不久他回信问：手枪交到哪里？我们又去信约定了地点，他亲自把枪交了，并且表示“以后再也不干特务的事了，你们征粮保证完成”。

北安河村有个中年妇女，外号叫“洋白面”，他是伪大乡长赵朴的姘头，他经常搜集我方情报向赵朴报告。1946年秋，队长王秀川领着我们在北安河开展工作，住在一家开店的赵家大院。那天我们要改善伙食，吃大米饭炖猪肉。那时候，生活艰苦，平时摸不着这样的好饭吃。不巧，饭才熟，有人报信：“敌人进村了！”好在敌人还没有包围大院，我们凭着地熟，打了一个多钟头，才突围出去，坐在山梁上，我打开夹着的草帽子，一帽壳米饭炖肉还热乎呢，折了两根棍儿就吃起来，别提有多香，这是我临走时盛在草帽里的，大家看见都和我抢着吃，后来叫我“饿不死的王树瑞”。

这次被围，经过查实是“洋白面”送的信。后来，我们抓住了她，执行枪决了。

1946年冬，东埠头一带有国民党青年远征军一个连驻在黑龙潭的山脚下，山脚下有个据点叫杨庄子。经过了解，据点里只有五个特务，都是当地的地主、伪保长的子弟。据点周围有电网，夜里通电，特务看守道口。太阳一出，电网断电。上午特务睡觉，下午他们就到各村活动。为了打击特务活动，由区委书记高树存带领一个小分队，夜间埋伏在特务的据点附近。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突然闯进特务的房子里，五个特务都脱的精光睡的正香，乖乖地当了俘虏。我们把他们押到北安河，五个特务的家里都托人找我们谈判，说：“只要把人放回去，要什么条件都答应。”我们要他们送来五只驳克枪、五十发子弹。没过多久，他们就把枪和子弹放在点心匣子里，以走亲戚为名，给送到武工队来了，我们对这五个特务说：“以后不能当特务了，武工队到村征粮，如不完成，格杀勿论。”他们连连点头说：“照办、照办。”

1947年冬天，驻守门头沟龙泉务的伪军九大队，到我昌宛县上下苇甸抢粮，我县大队在上苇甸的山上把伪军九大队三百多人追击下来，他们狼狈回逃。这时，县委指示武工队在两小时内赶到单里村山头进行阻击。

单里村距我驻地妙峰山四十里，我们一路奔跑，按时赶到山头，才架起机枪，九大队就逃窜到山脚下了，这里只有一条小山道，路外手就是滚滚的永定河，我武工队突然火力齐发，敌人乱作一团，往回跑，我县大队已经追过来，一场激战，九大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正在阻击时，突然武工队背后响枪，原来小山坡上还有一班伪军，我和李长春立即冲上去，几颗手榴弹扔过去，我俩大喊：“交枪不杀！”十二名伪军举手投降。县委表扬我们这次阻击战，跑得快，打得狠，取得了全歼九大队的胜利。从此，伪军九大队再也没有成立起来。

王秀川同志永远活在平郊人民心中

平郊武工队从1946年夏建立到北京解放前夕，历时三年多，回忆走过的战斗历程，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取得的每一项胜利都是在区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和当地群众无私支援下取得的。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武工队的每项胜利又都与我们有一位英明的队长——王秀川同志分不开。

秀川同志是门头沟区沿河城人，高小毕业，1937年八路军进驻沿河城，他就是自卫队的队长，1942年日本宪兵队逮住他，给他施加酷刑，过电，灌辣椒水，手指扎竹签，他都没有暴露我方情况。1943年他十九岁，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他长得英俊，细高个，白肉皮，浓眉大眼，留分头；他性格温和，我们都说他是大姑娘。可是在战场上，他却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和人民心连心，他带领我们为老乡干活，和老乡拉家常，体贴群众疾苦，乡亲们亲切地称他“王区长”。

秀川同志常和大家讲：“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共产党员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冲锋陷阵的光荣战士。”他用自己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几次家里捎信来说父母有病让他回去看看，他都不曾放下工作回家一次。在我们几次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他总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高喊：“跟我冲”、“不要管我！”带领大家安全脱险。这样同大家生死与共的好队长，怎么不让人打心眼里信服他、尊敬他呢？不幸的是，他没有看到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而在胜利的前夕离开了我们。

那是1948年旧历三月十四日，秀川同志带领我们五个人在小峪河村开辟工作，吃过早饭，他来到前院小杂货铺串门了解情况，说话间走进一个人来。秀川上眼一看，就觉得很可疑。秀川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催粮草的。”秀川说：“你听着，我是八路军，你不要再干欺压老百姓的事了。”那人吓得直哆嗦，连声说：“是是是”。随着，秀川说：“我们八路军在山东孟良崮一举歼敌四万多人，华北的石家庄已经解放，东北除沈阳、长春几个孤城，已经全部解放，刘邓大军已经胜利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蒋介石就要垮台了，全国将解放。你们不要再干坏事了，唯一的出路是回家当老百姓，如果再干祸国害民的事，共产党是要跟你们算帐的。”那人连连点头，满口答应“是是是”，最后秀川说：“今天放你回去，以后看你的表现了。”那人点头哈腰的走了。

下午三点钟，秀川一出门，见对面房上有人，他马上退回来，这时对面房上敌人喊道：“交枪不杀！”原来我们已经被包围了，秀川马上作了突围的安排：“先把对面房顶上的敌人压下去，随后跟我冲”。我们顾不得突然事变产生的慌乱，连枪带手榴弹一齐往对面房上打去，迫使敌人下了房，紧跟着在几颗手榴弹硝烟中，秀川一声大喊：“跟我冲！”我们就窜了出去，硝烟未落，我们已经冲出了大院，一直向着村南的小桥跑去。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时我以为已经冲出来了，后边的敌人追不上了，谁想到当秀川第一个踏上小桥的一眨眼间，桥对面突然发生猛烈的射击，只见秀川应声倒下，他急切地向我们喊道：“不要管我，快撤！不要管我！”我们几个人向各处分开了。

我跑了十多里地，后边枪声听不见了。实在跑不动了，嘴里渴得冒烟儿，就爬在稻地里啃才溶化的泥水。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嘴里吐出的气马上变成一股白烟。虽说天气很冷，可是我浑身的汗水都流湿了衣服。我爬在地里望着远处出事的方向，心想：“他们怎么样了？秀川他……我不能一个人回去，我要摸清他们的下落”。我来到苏家坨村边，这个村东西有五里地长，有三个敌人据点。天黑的时候，我悄悄地摸到村边一个老乡家，我叫开门，一看他家有老两口和一个儿子。老大爷见我浑身是泥，心里有点发毛，我也顾不得拐弯抹角就直接向他说：“老大爷，你别害怕，我是八路军，我想求您打听个事。”大爷问：“什么事？”我说：“听说小峪河村下午发生了战斗，您去给我打听一下双方伤亡的情况”。老大爷一听，犯了难，摇着头说：“这可不成，要是碰上国民党……”我没等他说完，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大爷，您可以装作是走亲戚或者请大夫的……”不管我怎么问，他也不肯去，我急了：“这样吧！我把你儿子带走，在村南坟地里等你，天亮以前你要是不去，我就带走他！”说着，我拉起他儿子就走，老俩直央求我，我说：“你老俩放心，我保证孩子的安全。”老头无奈，只得去了。

为了防备万一，我和那孩子在距坟地一百多米的小沟下等着。天虽然很黑，可是呆时间长了，反而能看见四周的动静，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个人影向坟地走来，我问那孩子：“那是你爹吗？”小孩眼尖，一看就说“是”，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别人，才让孩子把他爹叫过来。老乡跟我说：“我问清了，下午有五个八路被包围了，死了一个，逮住了一个，跑了三个。伪军死了一个。”听他说，死的那个八路，留大分头，在小桥上打断了腿，国民党想抓活的，往过一跑，那人一甩手枪，就把当头的伪军打死了，随后用最后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了。听人家说那人可是条硬汉子呀！”“秀川同志永别了，我的好队长！”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流下来，我用袖口抹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我感激地拉着老乡的手说：“惊动您了，老大爷，实在是对不起呀。这半夜三更的。”老乡领着儿子走没在黑夜里，我又走了十多里地回到武工队驻地——车营，向政委李子明同志汇报了情况。秀川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平郊人民为失去自己的好武工队长悲痛万分。在追悼大会上，人们痛哭流涕大放悲声。时至今日，平郊人民回想起解放战争时期，没有不提到王秀川的大名的，而且每当提到，人们都赞叹不已。王秀川同志永远活在平郊人民心中。秀川牺牲后不久，东北大军进关，包围了北京城。我们武工队根据上级指示，有的南下，有的开展城区斗争，有的参加野战军，为解放全中国踏上了新的征途。

注：

①全国解放后，我们镇压了特务崔严。他是假装催粮草的被王秀川同志教育后放回，去沙河伪大乡报告，沙河大乡队和昌平县大队纠集一百多名伪军包围了我们。

②此稿又经常甫、张国栋、宋永宽提意修改。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房山县建委干部